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〇一期 ——
(二〇一三年七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7a)

【史海钩沉】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 背景	李海文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五)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 背景

• 李海文 •

(作者原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63 级学生、中共党史研究专家)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时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真相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起重要作用的张恩慈是何许人也？他与康生、曹轶欧是什么关系？

1. 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2006年9月采访石

仲泉) 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加之他有心脏病,无法适应山区的生活和工作,(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心生怨气。1964年11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认为校、系很多单位都烂了,张恩慈是社教积极分子,并吸收为工作队员。当时哲学系有一批左派,即社教前期的积极分子。1965年3月贯彻《二十三条》,邓小平、彭真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肯定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是好同志,撤换了工作队队长。4月,中宣部、教育部、北京市委联合在国际饭店召开工作队部分骨干分子座谈会,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这个会议1965年9月结束,只有哲学系一个组1966年1月结束。其间,张恩慈也被叫回来参加国际饭店会议。会后,当时毛主席要求大学生都要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全国的大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乡下参加一期或两期四清,哲学系不少社教前期的积极分子也在其中。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1963年左右,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当时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张恩慈写的批判“合二而一”文章据说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由康生亲自点名,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马列主义研究院1964年成立,在西颐宾馆办公。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也是张恩慈能够知道中央动向的原因。

2. 周恩来说大家没有传达任务,康生却向张恩慈透露《五一六通知》内容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第二次扩大中央常委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常委外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六个大区书记,简称第二次杭州会议。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一,毛泽东批评彭真,解散了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因是彭真、陆定一、康生等五人组成,又称为五人小组。其二,原则通过康生、陈伯达、江青主持起草《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政治局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起草小组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xx,成员王力、关锋、穆x、吴xx、陈xx、尹x、张春桥。这些成员和后来正式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相差无几。

虽然原则通过文件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严格保密。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任命为中央文革起草小组顾问,成为最了解政治动向的核心人物。

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泄露党的秘密,轻者遭到训斥,重者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5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让大家看7个文件,5日、6日、7日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介绍情况。尽管刘少奇主持会议,却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

泽东汇报、请示。这与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着特殊作用。这个会议两个最令人惊骇的发言，一个是5日下午、6日上午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个是林彪5月18日关于政变的发言。5月7日中央通知李雪峰任北京市委代理第一书记，5月8日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号召干部揭发市委领导。市委机关内部开始出现大字报。

四、五月间，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因此与康生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了《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很有可能11日当天，康生在电话中得知了毛泽东的批示，但是文件要由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快也要第二天了，因为当时的飞机一天只有一班，火车要走一天一夜。文件到了北京，由刘少奇批示，印刷，发到与会者手上最快也是13日了。北大社教不仅是彭真，还有邓小平出面批评了左派，保了校长陆平。所以，康生即使知道毛泽东的批示，也不敢轻举妄动，还要看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此时，康生只能伺机而动，成立调查小组，放在由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之下。因为事关机密，让妻子曹轶欧任组长。真可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生对调查组成员说：这次调查重点是北大。“从北大点火，向上搞。”调查组名正言顺，任务灵活，不引人注意，可进可退。

1964年中央在北京十个单位搞四清试点，受到“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说法的影响，一开始都认为这些单位领导班子烂掉了。后来中央发了《二十三条》纠正了扩大化，有的重新撤换了工作队领导。康生精心考虑选中了北大，大概有三个原因。其一，北大社教前期有一批积极分子，有基础。其二、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从文化、教育系统发动的。北大名气大，影响大。其三、北大文人多，会写文章的人多。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康生住所会议室，康生同调查组6个成员会面，张恩慈是调查组成员，也在座。康生说：借调你们来是搞文化革命的调查，主要调查北大。调查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还谈到将要发一个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的通知。你们住在北大调查，不限于北大。

在杭州，周恩来叮嘱与会者：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严格保密。李雪峰不敢向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透露半句，而康生却向调查组的成员谈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真是大胆包天！康生之所以敢向调查组讲中央很快发一个批判彭真的通知，是要打消他们的顾虑，才能完成他的预定方案：“从北大点火，向上搞。”这个调查小组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台起了重要作用。张恩慈负责跑外勤，负责联系北大，在曹轶欧直接领导下工作，

3. 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大字报

13日或14日，毛泽东的批示及张恩慈的报告印发大会，在北大四清问题上，邓小平只能服从毛泽东。这时，康生有了尚方宝剑，开始行动。调查组的任务，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大会上讲得很清楚：“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张恩慈到北大找陆平谈话。此时，曹轶欧终于走到前台。陆平提出常委向她汇报一次情况，曹轶欧拒绝了。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曹轶欧、刘仰桥住在朗润园的专家楼，张恩慈等人住在一院。曹轶欧、刘仰桥在朗润园的专家楼只住了一晚，以后都将北大的人找到马列研究院所在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

曹轶欧之所以带张恩慈到北大，原因有二：其一，他的报告已经得到毛泽东批准，此事非

同小可。其二，张恩慈在北大工作多年，情况熟，关系多。果然，张恩慈一回到学校，哲学系的人纷纷找他了解中央动向，反映学校情况，他成为“哲学系左派联系中心”。张恩慈住在一院，和哲学系左派杨克明、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谈话、开会。由于张恩慈从康生那已知道《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这些消息“振奋人心”。受压的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

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规定传达到县团级。《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点了彭真的名，给人印象最深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场斗争和一般的党内同左右倾的斗争性质不同。党内左右倾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修正主义是属于敌我矛盾。杨克明向张恩慈表示打算写一份关于北大社教的申诉材料送中央，张恩慈告诉他：“现在北京市委机关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调查组到北大后不几天，除张恩慈外其余4人都到北京市委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抄清后交曹轶欧，再交康生。康生认为这些材料很有用。

起草大字报主要是6个人，聂元梓、杨克明、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夏剑彘一起议论，在赵正义的现成批判稿基础上，宋一秀修改，算第二稿。大家认为不能用，由杨克明起草第三稿，最后聂元梓、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夏剑彘（他农村回来，赶上此事）在一起讨论定稿。聂元梓签在第一名。

康生“赞同”、“支持”、“鼓励”，还是“策划”、“授意”、“指使”。看看杨克明当年1967年8月写给江青、戚本禹的信就很清楚：“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过了12年，到1978年12月，杨克明写的材料仍承认张恩慈告诉他：“现在北京市委机关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搞。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张恩慈说不方便，因为曹轶欧嘱咐他：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这符合康生一向谨慎的作法，14日调查组进北大，一直到17日，《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才由中央理论小组正式向北京大学发函：介绍曹轶欧、张恩慈等7人来校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大会上讲得很清楚：“关于我爱人的问题，是五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

大字报的内容写什么呢？1979年7月16日刘仰桥回忆：“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在北大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5月14日陆平传达了宋硕讲话），就认为抓到东西了。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是围绕宋硕讲话进行调查。”

再看看张恩慈在1978年12月写的材料：“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杨克明打电话给我，并且很急，说他们被围攻怎么办，你们调查组管不管？！我说你怕

什么？有《五一六通知》怕什么？并说上边领导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说的上边领导，就是康生、曹轶欧。”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重新审视文革，开始指责、批评第一张大字报，但是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使写的，作者的责任并不大。1980年10月16日中央开除了康生党籍，每个人都要与康生、曹轶欧划清界线。情况发生变化，杨克明只承认，张恩慈告诉他：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只承认张恩慈告诉他们：要串连左派。可以写大字报。“串连左派”可以理解为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搞派别活动，如果毛泽东没有批准大字报，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说这些话都是要杀头的。别说张恩慈，就是康生也不敢大胆妄为。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后，引起师生激烈地辩论，个别人甚至你推我搡。众多外国留学生在北大学习，他们将消息迅速传到使馆、国外，成为当天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头条新闻。周总理派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到北大讲话，批评将大字报贴在外面，张彦传达周总理的话：“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康生见事情闹大了，十分恐慌，和陈伯达一起诬骗不明真相的李雪峰到北大讲话，尽快平息事态，以免进一步恶化，引火烧身。同时派张恩慈到北大要来大字报底稿，火速送到杭州。

另外，有人说毛泽东的批示没有批在康生送的底稿上，因而怀疑康生是否向毛泽东送过大字报的底稿。现在档案没有全部公开，就是根据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记载，毛泽东是在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社总编室编辑27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3期上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请酌办。”请读者注意两点，其一，红旗杂志社的主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光明日报总编辑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x，而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说明，中央文革小组的步调一致，配合默契。其二，毛泽东既不是批给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也不是批给登载此消息的红旗主编、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一人，而是批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陈伯达俩人，康生的名字还列在前面。为什么？因为康生负责向远在外地的毛泽东传递文件，汇报北京情况。毛泽东的批示更加证明康生与大字报的关系，是他积极向毛泽东推荐的。

正因为康生在北京很孤立，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后，感到解放了。1966年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万人大会上讲话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大字报贴出后指出陆平、彭佩云、邓拓黑帮，实际上是揭露了彭真黑帮。但是大字报贴出后，北大在陆平、彭佩云、统治下，通过亲信蒙蔽同学，造谣说：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7点过后受到围攻，对革命大字报的进攻。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接到大字报，立即采取行动，（6月）1日下午4点，电话通知我，要马上广播。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当时，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大字报共有7位作者，康生只点了两位，一位是签第一名者，一位是撰写者。还特别点到不是作者的张恩慈，就是因为他起了特殊的作用。同时，康生宣布：“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后来北大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就叫新北大公社。当时我作为北大学生，在东操场参加万人大会，听了康生的这个讲话。

为什么康生感到解放了？为什么在接到毛泽东电话前康生会如此紧张？因为早在1954年2月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时，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中央做出几项规定，明确指出：“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 and 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此后，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集团，高岗自杀，

饶漱石被监禁。至今都没有平反。

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落得如此下场，康生会怎样呢？后来，康生连升三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但是，他死后也没有逃过惩罚。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追根溯源，人们纷纷要求追究康生的责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悼词，并把他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第三条罪状就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幕后策划下炮制的”。康生已去世四、五年，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岗死后，周恩来亲自到现场，宣布厚葬。至今高岗安睡在万安公墓。相比之下，康生死后仍不得安宁。

在张恩慈在哲学系做工作的同时，曹轶欧在校、系领导中活动，她首先动员法律系主任陈守一。陈守一是5级干部，资格老，影响大。陈守一断然拒绝。曹轶欧碰了钉子，才转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这所以出于哲学系，这与左派力量强大有关，也与张恩慈的工作成效密不可分。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无秘密可言。非也。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吸收了不少群众代表参加，8月7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上印发。会议12日结束，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公开了中央领导人新的排序，19日在清华出现贴刘少奇大字报。红卫兵走出学校冲到社会，全国开始大串连。直到21日深夜（或叫22日凌晨）不知何人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观者如潮。当时北大是一个中心，串连的学生蜂拥而至。半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等全国各地，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到北大，令人覆盖大字报，批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权新华社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言论。任何人无权擅自公布。他们也是在会议结束后的八九天才敢这样做，还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说不定这是中央文革演的双簧戏。

另外，1969年召开九大，有不少造反派当选为九大代表。代表们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才开会。当时规定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外出，在宾馆里不准拉开窗帘。代表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会议从4月1日开幕到24日结束，曾开过3次全体大会，数千人出动，两辆车一批，分批进入人大会堂的西门。到处打听消息的外国记者硬是没有发觉我们正在开九大。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很满意。

文革后，什么会议不能保密呢？1966年10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打倒各级领导，各级机构瘫痪。1967年一月夺权后，为解决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问题，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各派头、老干部代表来北京开会。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纪律，随时将会议情况通报给自己一派群众，会内外响应，制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压力。

1966年5月，张恩慈向哲学系左派“透露”时，中央机关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和群众组织完全不同。张恩慈讲到什么程度，做事做到什么程度，都要请示，绝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他忠实执行曹轶欧的指示，暗中支持，有所回避。在抄写大字报时没有在场，他很后悔，不止一次讲：如果我在场，不会让聂元梓签在第一名。

4. 写大字报是一个集体行动，聂元梓签在第一名

年青学者印红标的文章写道：“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这是大字报署名者6个人一致的说法，但是一面之词，我们应听听聂元梓是怎样说的。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2005版，第116—117页）写道：“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曹轶欧在西颐宾馆接见了我和杨克明，在座的有张恩慈。我们汇报后，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样不行呢？”“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请示了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就放心了。”

聂元梓回忆，曹轶欧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除了聂元梓说的这一点外，曹轶欧之所以不问大字报内容，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此事不成功，一旦追究起来，她可以说自己并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只有失察之责，来逃避、减轻惩罚。她的一举一动关系到康生的政治生命、荣辱、升迁，她不能贸然行事。

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理决定，停止他们的一切职务，进行专案审查。文件下发到县团级。聂元梓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第二天24日，大字报已改出第二稿，第三天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这绝不是巧合。没有可靠的内线，没有康生这样大人物强有力的支持，这7个人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开贴出大字报。

退一万步，就是按那六个作者讲的，不知道聂元梓见过曹轶欧。是不是这件事就不是康生、曹轶欧指使呢？写大字报是一个集体行动，聂元梓签在第一名，后人以此称为聂元梓大字报。为什么让聂元梓签在第一名呢？六个作者的说法：因为聂元梓是系总支书记，是7人中资格最老，地位最高者。大家尊敬她。后来这6个人迅速和聂元梓分裂，也可以证明他们对聂元梓的尊敬是有限的。

哪为什么让聂元梓签在第一名？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谁签在第一名，谁负的责任最大。这些教师都经过反右斗争，1957年夏，因为贴大字报，串连，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有的病死狱中。自然知道贴大字报的另一种后果。共产党历来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聂元梓敢挑这个头就是因为她事先和曹轶欧谈过，她知道康生的态度，知道底细。如果她不签字，别人还敢签字吗？特别是5月24日北大刚传达了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出大字报的5点指示，强调内外有别。他们怎么敢无视党纪国法。如果聂元梓不签在第一名，这张大字报还能出笼吗？历史不能假设。现在的事实是无论聂元梓有没有动手写，是不是第一个提出写这个内容，她见过曹轶欧一事是否通报别人，对这些细节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细微末节并不影响事物的本质。重要的是聂元梓签在第一名。正因为她签在第一名，其他都签在她的后面，才有了这张大字报。她职务最高，她带领这些人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贴出大字报。正因为她签在第一名，责任最大，当大字报受到批评后，是她向华北局、北大副校长黄一然解释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正因为她签在第一名，责任最大，所以广播这张大字报后，她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由此当上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平步青云，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1968年8月，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进驻学校，毛泽东接见并批评首都院校的五大领袖，其他四个都倒了，只有聂元梓没有被打倒，在九大还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也正因为她是文革的一种象征，又在文革中作恶多端，1978年被依法逮捕，1983年被判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5. 毛泽东在众多大字报中选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

（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 x x 写的大字报才是真正第一张，是 5 月 23 日贴出。但是，吴 X X 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北京市委、中宣部。一个原因，杨述 1961 年 1 月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另一个原因，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受到鼓动，听到会议的情况，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

25 日，卢正义在教育部也贴出大字报，只针对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和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只有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彭佩云，还点了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由此而联系到北京市委。所以比较了几张大字报后，毛泽东决定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从此，聂元梓一夜闻名天下，她的名字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

6. 张恩慈毫不隐讳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他授意写的。

如果说的回忆也是孤证，那么我们看看当年张恩慈是怎样讲的。1966 年 6 月 9 日，北大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老师孔繁的报告。主持人特别介绍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师，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他能在百忙之中到北大做报告，深感荣幸。我作为北大学生在大饭厅听了这场报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张恩慈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聂元梓等 7 人大字报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的过穿针引线作用而自诩。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那些否认康生曹轶欧“策划”、“授意”、“指使”写大字报，而认为仅仅是“赞同”、“支持”、“鼓励”写大字报的言论不攻自破。

为什么 40 年来我对这场报告记得这么清楚？报告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5 月 25 日，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四清，突然听到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聂元梓等 7 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半天时间贴出 1500 张大字报，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大饭厅前的辩论，甚至有人动手推搡。后来，听说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到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总理，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这时，聂元梓也害怕了，向华北局说明这张大字报是曹轶欧让她写的。本来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事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6 月 1 日晚 8 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全文。当时我们所受到的震撼至今难忘。虽然我们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大家都明白形势突然发生 180 度的变化，这决非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接管了学校。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人人都希望知道这张大字报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张恩慈的报告揭开了谜底，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张恩慈对聂元梓有意见，张恩慈说他要在场，就不会让聂元梓签在第一位。他曾向康生反映过聂元梓的问题，但是康生说：“她是乌龟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这句名言在北大也是众所周知。7 月份写大字报的 7 个人分裂。这个时间是从 1966 年 7 月 24 日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会议记录查出来的，“讲到怕聂元梓等七人分化时，毛泽东说：分化就分化，怕什么分化？”学校始终存在反聂元梓的一派，与康生的这句话有关，也与张恩慈的态度有关。

虽然，张恩慈与康生、曹轶欧相熟，他并没有再做其他的事。但是，张恩慈为此付出了代价。1969 年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重新分配，许多同志留在北京，张恩慈却到山西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党校，他任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后到山西大学任教。他一直想回北京，中央党校等好几个单位想要他，但都因《198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在康生组织第一张大字报一事中点了张恩慈的名字而未能成功。时

间是矛盾最好的消融剂，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呢？当这天到来时，还能不能做事，还能做什么呢？

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成为文革的起点，标志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张恩慈及大字报作者在特定环境下，被历史潮流推到风头浪尖上，扮演了重要政治角色。文革这场火烧了10年之久，自有深刻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绝非他们所能左右、所能预见的，他们更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为此付出代价。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不容有任何篡改。只有保存真实的历史，后人才能更好、更准确地研究历史，更深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不再重演动乱的历史。

（作者后记：本文写作时得到王效挺、王海光、韩钢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2006年9月12日第一稿，
2006年9月13日第二稿，
2006年9月19日第三稿，
2006年10月11日第四稿，
2006年12月22日第五稿（根据王效挺老师的意见修改）

□ 原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五）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6 c 〕

## 第六章 在高压下抗争的“414串联会”（1967。4—1967。5）

### 第一节 “414串联会”首次行动是强夺总部广播台，极不光彩

在整风和干部问题这场大论战中，有一批隶属于纵队派的战斗组，如沈如槐的“千钧棒”、陈楚三的“战地黄花”、孙怒涛的“第一湘江”、汲鹏的“轮机兵”、倪振伟的“二万五千里”、尹尊声任彦申的“刺刀见红”、黄瑞和的“不怕鬼”、周泉纓的“云水怒”、段云富的“巴黎公社”、高季章的“锔未残”、宿长忠的“翻腾”、张雪梅的“八八探照灯”、刘万章的“红色小老虎”、郭仁宽的“暴风骤雨”、任敦渭的“第一红五星”、李贵芝李伯川的“人民万岁”以及“从来急”、“风雷激”、“争朝夕”、“鹰击长空”、“曙光初照”、“八八春雷”、“1356”、“开新宇”、“第一靠舵手”、“第一换新天”、“第一高举红旗”等，他们观点鲜明、影响较大，成为纵队派的代表。

由于观点比较接近或一致，因此就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交流信息、分析动向、切磋对策。

当时大家一致的感受是，尽管这些战斗组的能量很大，战斗力很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全校运动的大局有影响，也得到相当多师生的支持和赞同，但是，与已经上台掌权，既得到中央文革支持和社会承认又掌握了学校全部资源的总部相比较，那就显得势单力薄，无法抗衡了。

“28团”和纵队派的“四纵一团”（“天安门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毛主席警卫团”）是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后成立的。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求解散跨车间、跨班组、跨系、跨班级的组织，按行政系统实现大联合的社论。兵团总部以此为契机要求解散纵队，回班级闹革命。“28团”率先响应，“天安门纵队”、“毛主席警卫团”跟随其后也宣布解散。其他“三纵队”硬撑了好几天，到3月11日，不得不也宣布解散。

从3月中到4月中这一个多月里，没有纵队支撑的“纵队派”与兵团总部在干部问题上的激辩，都是以战斗组形式进行的。“纵队派”一方面深感兵团总部对清华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对于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很不得力，有时成了运动深入发展的阻力，另一方面又痛感“纵队派”自从各纵队解散以后，力量分散，单体弱小，难以协调，无法用一个声音发出最强音。怎么办？经过多次串联协商之后，认为唯有再走联合之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最初密谋搞一个串联会的是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毛主席警卫团”的头头和骨干。他们商量有了初步意见后再找“毛泽东思想纵队”和“天安门纵队”协商。就这样，由二十多个战斗组作为发起单位，决定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

因为串联会的名称实在太长，而成立的时间定在1967年的4月14日下午，所以有人提议这个串联会简称为“414串联会”，获得大家的一致通过。

广东话“8”就是“发”、“4”就是“死”之类的彩头和忌讳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流行开来的。以日期作为组织名称，这在当年是常见的现象。至于414成立以后有人把“414”写成是“四幺四”、“死要死”、“试一试”等等，都算是派战时期或调侃或贬义的414别称吧。为什么不选更早一天或晚一天，别无更多深意，是水到渠成而已。

在西主楼3—208教室，出席“414串联会”成立大会的“有700余人，代表250余个战斗组。陈楚三主持大会，刘万章、谭浩强、傅正泰、魏洪波、唐伟、孙怒涛等人轮流发言”，并顺利通过了预先准备好的《414串联会第一次大会决议》。

当晚，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来自何方”的辩论会。“414串联会”参加了辩论会并在会上宣读了第一次大会决议。散会后已近夜深。之后又在北院的一间教室里召开414发起战斗组组长会议。

那段时间，大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怎样推动干部问题上的大辩论，怎样应对兵团总部的压制上。在成立“414串联会”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都是以协商办法决定的。串联会本来就是一个虽然规模比纵队要大，但是比纵队更为松散的组织。这次战斗组长联席会议上，这个会上，有没有讨论“414串联会”的领导班子，或者讨论到什么程度，这点存疑。我并不记得讨论“414串联会”的一把手问题。当时的形势、氛围以及时间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条件。

但有一个议题肯定讨论了。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到了总部广播台拒绝广播“414串联会”成立的公告和海报。一说起这事，大家心里都愤愤不平，很是有气。

在大字报区，“纵队派”完全可以与兵团总部相抗衡。“纵队派”大字报的质量与数量常常占优。但是大字报一定要有人前去观看才有效果。而且，有些精心写作很有分量的大字报，贴出去不到一两天甚至才几个小时就被人用粗制滥造的大字报或者直接用大标语覆盖了。这是大

字报的短处。一想到这，非常郁闷。

大会辩论，也要由总部组织才能开得起来，因为场地和扩音设备全掌握在总部手里。曾经有过几次辩论会，总部往往处于下风，所以，有时总部对“纵队派”要求大辩论的叫板，宁愿缩头，也不开辩论会。

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全校的广播系统了。广播可以从清晨一直到深夜不间断地叫唤。即使在吃饭时，休息时，那高分贝的喇叭声直灌耳朵，你不想听也得听，无处可躲，无处可逃。

总部手里有广播，4 1 4 手里没有广播。总部独霸着最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发出的都是总部这边的声音。

所以，会上一说起广播，与会的人莫不情绪激动，认为兵团总部的广播台应该播发不同观点的稿件，不能只有代表总部的一种声音。

有人提议：把总部的广播台夺过来（名曰“暂时接管广播台”），以此向总部表达要求彻底改组广播台的强烈诉求。这提议像是一针兴奋剂，大多数人都很感兴趣，表示这是个好主意。

我想，要是从总部手里把广播台强夺过来，肯定要引起严重冲突的。这只能激化矛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明确表示反对强夺广播台。

马上有人将了我一军：“老孙，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永远被总部压制着不发声吗？”

强夺广播台是不对的，是不应该这样做的。要是强夺，就是我们在用不讲理的办法对付总部的不讲理。这是我的直觉。但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的主意既能冲破总部的压制又不至于激化矛盾。既然我提不出一个能让大家都接受的比强夺广播台更好的方案，于是只好闭嘴不再讲话。

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要能集中正确的意见，说服貌似有理的不正确意见，会出好的点子。我只能辨别强夺广播台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说服不了大家，也想不出好的点子。所以，我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头头。

多数与会者都支持这一行动。我印象中，沈如槐等先前是“三纵队”的那些战斗组长最积极。只有极少几个先前是“天安门纵队”的战斗组长表示反对或没表态。串联会的议事决策规则就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多数同意了就算通过。既然大多数同意，于是就开始具体行动的策划。

我听着他们的策划，既没有再吭声，也没有退席以示不满。对于他们即将实施的行动，我当然不会参加。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强夺广播台的行动是会上的临时动议，还是有几个战斗组事先已经有过密谋拿到会上来讨论的。总之，这是一次由“4 1 4 串联会”多数战斗组长同意、以“4 1 4 串联会”的名义组织实施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

会议最后决定在第二天中午趁人不备之时，派一支小分队强行接管在明斋的总部广播台。会上落实了要接管的人员以及准备要广播的稿件。

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很晚才结束。

尽管我不赞同这次行动，但毕竟是“4 1 4 串联会”的第一次行动，而且是极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行动，我非常挂心，惴惴不安。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一直在三院后西大操场东的那块操场上徘徊。这天中午我没心思吃饭就跑过来了，眼睛不时地瞄向明斋，遥望着那里的动静。我心神不宁，十分忐忑。我不知道今天的冲突会是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结果。我甚至不知道我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知道我不希望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不希望打斗、不希望受伤、不希望流血。我当时还闪过盼望这次行动因为某个意外的原因而取消了的念头。

突然，全校的大喇叭中断了正常的广播。接着，传来了另一个广播员播出的《4 1 4 革命串联会就暂时接管井冈山广播台告全校革命同志书》。这是“4 1 4 串联会”强占广播台前预先准备的广播稿。稿子还没广播完，又戛然而止。过不了一会儿，看到明斋东南门口围着一大群人，不断有人从门里踉踉跄跄地被挤推出来。我知道这次偷袭、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已经失败，我不忍心再继续旁观惨不忍睹的失败，懊丧着回1 2号楼的宿舍去了。

接下来的一幕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参加，是后来有人绘声绘色给我讲述的：

这支失败了偷袭队伍并没有灰溜溜地做鸟兽散。在现场的4 1 4 负责人把这支凌乱的队伍集合起来，先在明斋前开了4 1 4 第二次串联会，接着以悲壮之师的形象在西大操场、大礼堂区游行，一路高喊反对总部压制言论自由要求改组广播台的口号。沿途有不少同情4 1 4 的师生加入，最后居然集结起一二千人，再沿着二校门前的东西干道一路游行到主楼前广场，开了一个颇有声势的4 1 4 第三次串联会以后才结束。

事后，4 1 4 的头头们沾沾自喜地用坏事变好事来总结这次行动。虽然具体的行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在锻炼队伍、扩大影响、凝聚人气上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在以后的一次4 1 4 会议上，也说“4。1 5 行动是一个失败的行动，但却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显然，我当时是站在派性立场上，用“革命的行动”为4 1 4 群众鼓气，只是掩盖错误的一种自我安慰。

自文革开始以来，冲突已经多次。8。2 4 的红色恐怖，那是自称最革命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针对“妄图翻天”的“阶级敌人”的。主席台上争抢话筒、彼此推搡，那也都是在公开场合情绪激动时的过分表现。一个下属的群众组织对其上一级组织的要害部门进行偷袭强占，这在清华文革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团四两派的关系史上也是第一次。就性质而论，是极其恶劣的。

幸亏当时还没有武斗的氛围。4 1 4 是赤手空拳去强夺的。广播台没有设防，团派也是赤手空拳把4 1 4 的人挤兑出来的。这一次事件，有人说是武斗，有人说是冲突。这肯定不是文斗，硬要说是武斗也未尚不可。但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群体冲突。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要故意减轻这次冲突性质的恶劣。武斗不就是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地升级，从徒手到器械，从长矛到真枪实弹演变而成的吗？

这次冲突的原因和责任，双方各有各的说法。4 1 4 声言，总部的高压政策是造成这次冲突的根本原因，总部应承担全部责任。总部当然把原因和责任全归于4 1 4 方面。

我认为总部对不同意见的群众实行高压政策是极其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构成414强占广播台的理由。414要求总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它属下的每一个群众组织，不得歧视，更不得压制。414的要求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如果以不合理、不正当的手段来表达合理正当的诉求，那么要求的合理性、正当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414企图以过激的方式达到改组广播台的目的，也就是想以暴力手段实现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这样的思维是完全不可取的。

以暴制暴，其结果是暴力升级、矛盾激化。想以这样的方式让蒯大富改正压制不同意见的错误，效果恰恰相反。蒯大富当天就宣布“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一部分……命令广播台不准广播414一切文章”。414以自己的错误“引导”蒯大富去犯更大的错误。这虽非414的主观故意，客观效果看上去很像是如此。

这件事情也惊动了中央文革。414要求向谢富治汇报而遭拒绝。414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动就让自己在中央首长面前丢失了印象分。

这次冲突是谁挑起的？是414！谁该负主要责任？也是414！

长久以来，许多团派群众始终对414强夺广播台这件事耿耿于怀。这也难怪，因为“414串联会”的成立标志着“井冈山兵团”内部组织上公开出现了一个反对派，4.15强夺广播台的行动开创了用暴力解决政治问题的极坏先例。

414方面，在其后的派战中对强夺广播台的错误行动，没公开承认过，检讨过。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和深远影响认识不足，没有深刻的反思。这是很不应该的。

老实说，在“414串联会”成立的当天所组织的第一次行动竟然是强夺广播台，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也是我心里一直极不舒服的。我当时虽然表示了一个反对的态度，也没参与这次行动，但是事后我为了414的派别利益竭力美化这一行动。长期以来，我的认识一直是很肤浅的。

414没有自己的广播台，犹如一个人没有喉舌般的痛苦。此后十几天，参加414的一些老师自发捐款购买广播设备筹建414广播台，有的捐几十元（相当于一个年轻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有的甚至捐几百元（相当于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58这让我们这些没有工资收入的学生们极为感动。就这样，4月30日，414终于有了自己的广播台。

我在4月14日那晚想不出的办法做不到的事情，414的群众就这样帮我们解决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这样评论蒯大富、沈如槐和我的表现：

说蒯大富：受压的时候讲理，掌权以后就常常不讲理。

说沈如槐：你讲理我也讲理，你不讲理我也敢于不讲理。

说孙怒涛：你讲理我也讲理，你不讲理我只好闭嘴不再讲理。

对蒯大富、沈如槐如此这般的评论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感觉是有点过分了。但是对我的评论，我觉得虽不是全部至少在不少时候确实是这样，很形象、蛮到位的。当然，具体到强夺广播台这件事情上我后来闭嘴不说话，并不是因为主张强夺的人对我不讲理，而是我的理不足以说服对方的理因而我只得闭嘴了。

## 第二节 身兼三重身份，同是两派要员

从“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在清华的政治舞台上，我成了一个活跃分子。

我有三重身份：

我的第一重身份是“第一湘江”的组长以及“天安门纵队”的主要负责人。这是我的“山头”，我的根基。“第一湘江”和“天安门纵队”因为经常发表一些篇幅较长、观点不太偏激、态度比较平和、较为说理的大字报，因而在校内有比较大的影响。3月初，积极响应总部的要求，“天安门纵队”解散了。在“4 1 4串联会”成立以后，我们把原“天安门纵队”的战斗组又串联起来，成立了“三七战团”，与“三纵队”解散以后又成立的“东方红战团”相呼应。

我的第二重身份是兵团总部核心组委员。凡是通知了我的总部会议我都参加了。这使与其他总部委员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总部的各项决策的背景和过程也知道得比较清楚。我经常在全校的大会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发表讲演。大字报、大喇叭上也经常看到听到我的名字，偶尔还会成为某一事件的焦点或争议人物。

我的第三重身份是“4 1 4串联会”的负责人之一。不仅参与了“4 1 4串联会”的发起，也是“4 1 4串联会”负责人中唯一的一位总部委员60。因为在整风问题上，在干部问题上，我与“三纵队”的观点比较接近或一致，所以经常与“三纵队”的头面人物开会讨论，对他们的个性和为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等到4 1 4总部成立以后，我成了4 1 4总部的核心组成员。当然，到那时我不再是兵团总部的委员了。

在兵团总部内部，我是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就是说，我的观点与总部其他委员的观点，彼此都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但是我又不是一切都与兵团总部对着干的“反对派”。在不少事情上，我与总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譬如，我也坚决支持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批斗。当中央决定王光美回清华接受群众批斗后，我虽然没负责具体工作，但是总部每次开会讨论研究批斗王光美，我都参加了。4月10日那天在中央主楼前广场召开的有三十万人参加的揪斗王光美大会上，我就坐在主席台前排最东边的那个座位上。

明知我已经与兵团总部离心离德了，明知我与“三纵队”明来暗往、内外呼应，蒯大富仍然把我留在核心组内而没有一脚踢开，每次总部会议仍然通知我参加。甚至当我成了“4 1 4串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蒯大富一直误以为我是“4 1 4串联会”的一把手），总部的重大决策都没有回避我。在这一点上，蒯大富对我还是显得宽容有雅量的。

几十年以后，蒯大富当面对我说，那时总部对我的压制是不对的。老蒯此话意在反思。其实，平心而论，我当时在总部里虽然感到有点压抑，但是并没有被粗暴地压制。

在总部开会议事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会有争论的。我在兵团总部里是明显的少数意见甚至是个别意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不采纳我的意见那也是很正常的。随着兵团总部与纵队派、后来是与4 1 4的分歧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我也慢慢地失去了在总部会议上与其他总部委员喋喋争论的兴趣。因为，一来，我的观点在大字报或者大会上都是公开的，彼此都明白，谁也说服不了谁，再争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二是我擅长于即兴辩论。这需要机敏。我脑子转得比较慢，往往需要思考后再想着怎么去回驳，而且往往需要拟成提纲以后才讲得有条理。一对一的面对面辩论，我尚且应付不了，更别说我要与总部里那些特有辩才的同僚辩论了。所以，在后期，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一般都把我不赞同的观点尽量记下来，以免忘记，以备反驳。鲍长康老是对我说：“老孙，你别光记呀！你也说话呀！”老蒯也常说：“大家都别吵，

先听老孙说说。”所谓压制，就是不允许别人说话，或者说了后组织围攻。少数意见不被采纳，或者没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压制不同的意见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与兵团总部对我的态度相比，对414的态度确实算得上是打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总部对我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414则是按“准敌我矛盾”处理的。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后期在总部会议上只记不辨的态度引起绝大多数总部委员的反感。他们以为我拼命记录是为了向“三纵队”头头（后来是“414串联会”头头）通风报信。这点上他们误解了。我生性讨厌偷偷摸摸的不光明做派，不屑于“里通外派”的勾当。作为公开的反对派（而非隐藏的内奸），在我参加的总部会议上也没有讨论什么不能外传的秘密，我所记录的都是一些其他总部委员观点的原话。但是话说又回来，其他总部委员的反感和误解并非没有道理，都是因我的不当做法所引起。

后来我到了414总部，因为在观点上比较一致或相近，我所代表的“三七战团”成了与“东方红战团”并肩战斗的一支重要力量。沈如槐的工作作风也比较民主，所以我在414总部里得到更多的尊重，意见也往往被采纳。这比在兵团总部里的感觉要良好。但是，我要说的是，在414总部里开会的时候，个别不民主的粗暴现象同样存在甚或要超过兵团总部。

### 第三节 两位团委干部，参加过“第一湘江”的活动

在有关干部问题辩论的过程中，被工作组轰上楼还没有机会在群众面前做深刻检查没有被“解放”的清华干部，特别是中层干部，在辩论干部问题的过程中纷纷“亮相”。所谓亮相，就是以各种形式，主要是以大字报、公开信、发表谈话等形式表明自己的观点。

因为已经有兵团总部和纵队派（后来是414派）两种不同的观点摆在那里，所以，亮相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表态自己比较赞同哪一方的观点。由此，清华的干部队伍也基本分裂成两派。

414看到亮相到自己这边的干部当然是热忱欢迎的。人越多势越壮也越表示自己的观点正确嘛。要是亮相到总部那边，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有时候还免不了挖苦几句讽刺几下。对有辫子可抓的，一点都不客气。譬如，对我熟悉的自控系党总支书记凌瑞骥，414曾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揭他的老底，批他的罪行，声讨他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总部对亮相到414这边的干部也一样，亲疏分明。这“疏”，就不是一般的冷淡和批判那样的“疏”，而是打压、围攻，后来是抄家、抓捕那样的严酷了。

亮相到414这边的干部，响应中央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的号召，主动要求到学生战斗组里去。向“革命小将”学习，与“革命小将”相结合成为一种时尚。我们“第一湘江”就来了两位很知名的原团委副书记谭浩强和贺美英。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参加到学生组织中去的校中层干部，在当时曾是一件很震动的事情。以致在“井冈山通讯”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简讯：“‘第一湘江’公布成员名单，前团委副书记谭浩强、贺美英已加入‘第一湘江’”。

我在入学后不久就知道谭浩强的名字，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留校担任团委副书记，在学生中知名度很高。在文革中，谭浩强是最早亮相的清华中层干部，受到全校的关注。他曾写大字报公开反对蒯大富的否定一切、打击干部、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而同意414的“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观点。很多414战斗组都支持谭浩强，欢迎他参加学生的活动。可能是由于观点与我们比较接近，他们俩选择了“第一湘江”战斗组。他们来了以后，与我们在同一间大教室里活动，参加我们的讨论，大家相处比较融洽愉快。我们的身份是学生、“革命小将”，敢说敢干，说话做事没有什么顾虑。他们

的政治阅历比我们要丰富得多，看问题也比较全面，我们乐于与他们讨论一些问题，听听他们的意见。但因为他们当时的身份是干部，这与我们的学生身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总部常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当做是“操纵革命小将的坏干部”。我们组里也有个别组员比较左，训斥过他们。他们在这样的攻击和压力下，说话做事自然都比较小心谨慎。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份善良的心意：别给414小将添了麻烦。

记得有一次，我在大礼堂里作了一个发言，讲的好像是对蒯派要作阶级分析。我是做了充分准备并且写成比较详细的提纲的。那次讲演相当成功，台下的老四62一片叫好声。414在大礼堂开大会，414广播台当然也是全校直播的。大会完了我回到新水教室，看见谭浩强、贺美英非常兴奋激动，直夸我讲得好。他们奋笔疾书写大字报支持我的发言，态度非常鲜明。那一幕，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谭浩强在清华中层干部和“清华牌”干部63中，很有代表性。他能说会写，敢于亮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号召力。由他牵头策划、胡大忻执笔起草、146名干部联署，发表了一封《致全体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影响很大，不几天在公开信上面签名的干部多达331名。所以在解放干部的时候，414是把谭浩强作为清华中层干部的典型来解放的（还有两个典型是罗征启64和吕应中65）。这个典型可不好当。因为明摆着，团派对414树立的干部典型是要竭力打击的。在二月份谭浩强刚贴出《跌倒了站起来，誓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的最初表态时，曾得到兵团总部的肯定和鼓励。但当他明确亮相到414这边的时候，团派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责骂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是两面三刀人物”。蒯大富甚至发表了一封“致谭浩强的公开信”，说他牵头的这封公开信“是复辟旧清华、向革命小将开火的宣言书”。自谭浩强亮相到414以后，他一直经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我看到，他表现得很坚强。

文革以后，谭浩强成了我国最著名的计算机教育家。贺美英高升至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两位或从政或从教的成功人士在文革初期都曾经在“第一湘江”待过，也算是与我的一段缘分。

#### 第四节 “孙怒涛舌战蒯大富”，是有点影儿但此说有点演义化

“414串联会”成立以后，我与总部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有一天，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我与蒯大富在大礼堂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冲突。

那天晚上，兵团总部在大礼堂召开批判大会。

那个时候大礼堂开会，往往是这样的：在主席台的正中放一张齐胸高的演讲台桌，台面上放着一只麦克风。讲台的东侧靠后放一张条桌，再放二三把椅子，是大会主持人坐的。主持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即时处理台下听众递上来扔在主席台上的条子。根据条子内容的不同，有的要马上转送给讲演者，有的要打断发言宣读条子的内容，有的就压下会后再处理。

那天，我与刘才堂坐在主持人席位上。蒯大富正在做总结发言。在他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老蒯离开正题把话锋一转，提到了我。

老蒯说（大意）：“我们都知道孙怒涛同志身体不太好，刚生病不久，医生要他好好地静养一段时间。老孙，你可要好好地注意身体哦……”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感动，一阵热乎，觉得尽管我与他矛盾不断，他还是非常关心我、爱护我的。



老蒯话锋一转，接着说：“孙怒涛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你身体不好，夺了权也掌不了权，还是听医生嘱咐休息六个月吧……”

听到这里，我才听出味儿来。原来老蒯关心是假，警告是真。爱护是假，挖苦是真！

我筹建“天安门纵队”的时候，老蒯就不放心，以为我要拉出队伍另立山头，夺他的权，与他唱对台戏。后来虽然事实证明我确实是为了促联合，而且真心愿意在他的领导之下，但看来他的心结并未真正解开。这次我与纵队派搅和在一起搞“4 1 4 串联会”，他认定我也是与“三纵队”一样，又要向他夺权来了。真的是，前嫌未释，又添新疑。

老蒯在大礼堂这样正式场合的大会上对我讥讽挖苦，怀疑我的动机，我很生气。我作为“4 1 4 串联会”的一个重要负责人，他这样说，已经不是只对我个人的态度，而是与“4 1 4 串联会”直接相关的了。我真想马上站起来，对他的话立即予以反驳和回击。但是我这个人思维比较迟钝，反应也不够敏捷。正当我想着如何做出合适的回应，老蒯的演讲结束了，接着大会马上散了。

第二天在大字报区，有不少大字报（当然都是4 1 4方面的大字报）对老蒯的这次讲话表示不满，认为老蒯以这样没水平的话损一名持不同意见的总部委员，有点不厚道。更有的说，这等恶俗之语充分暴露了老蒯自身心地的阴暗。

我对老蒯的话也很气恼。冷静下来以后，我仔细地想了一想。我觉得我必须要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如果不吭声了，那就是示弱，就是默认，只能让蒯大富和团派看轻我，4 1 4群众也会瞧不起我的。但是怎么回应呢？直接说这是蒯大富的恶意攻击？或者也抓住蒯大富的过失来一个冷风热嘲给予回敬？想想都觉不妥。我想，最关键的还是态度要诚恳。我与老蒯毕竟是战友，他是我的领导。我与他之间是有观点分歧，也存在一些他对我的误解。只有以诚相待，才能化解误会，减少矛盾。

另外，蒯大富是在长篇发言中把我“捎带”进去的。我也应该在一个主题发言中“捎带”着回应他的讥讽而不能直接简单地回答。

第二天晚上，总部继续召开批判大会。我为在大会上的发言做了精心充分的准备。

那晚，我在大会的发言中“详细阐明了4 1 4与团派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我还）在发言中谈到‘将来“井冈山兵团”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文化革命后又怎样进行防修、反修？’（这话）引起团派（的）哄堂大笑。”我是联想到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好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何况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井冈山”呢？没想到我的问话竟引起哄堂大笑。在这些团派群众看来，我是一个杞人忧天的傻子。“井冈山”是革命的山、红色的山，怎么可能会出修正主义呢？

在我发言的最后，我也是话锋一转，说（大意）：“昨晚，蒯大富同志在演讲中提到了我。我首先感谢他对我的健康状况所表示的关心。”

在浅浅的肯定之后，我接着说：“我们‘井冈山’人造反、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清华园、在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我希望蒯大富同志能够团结绝大多数群众，能够团结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同志，真正为革命掌好权、用好权，而不只是为某个小团体而掌权。至于我本人能不能掌权，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4 1 4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

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最后，我用“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段我最喜欢最能激励我的语录作为发言的结束语。

这一大段话，显得正气凛然又情真意切，既有领袖伟言又充斥派性色彩。这段发言引来坐在大礼堂的老四的满堂喝彩。第二天的大字报区出现了许多支持我发言的大字报，赞扬我的发言有理有节。

几十年后，我还听到有人对我重提这件旧事，还冠以“孙怒涛舌战蒯大富”这样夸张的标题。这，说到底，都不过是两派头头在派战中斗智斗勇、唇枪舌战的一个小小花絮而已。

我已经忘记这次口水仗是哪一天打的了。

看到《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66日记》1967年5月4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晚上礼堂开辩论会，最后孙怒涛发了一个很好的言。昨晚蒯把孙讥讽了一番，说什么‘你要注意身体，否则夺了权也掌不了权’，姿态很低。今天孙态度诚恳，从革命利益出发对蒯提出忠告，姿态很高。”

感谢孙维藩的日记！有这一佐证，我不仅得知这次“舌战”的具体日期，也知晓这次交锋在两派的群众中确实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 第五节 我对权的认识，感觉很重要但又不会抓

蒯大富说我“夺了权也掌不了权”，这话说对了一半说错了一半。说我掌不了权，或者不会掌权，这点他看得很准的。他说错的一半是，其实是我并不想夺权、也不会夺权，更夺不了他的权。

什么叫权？权与我有什么利害关系？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

从高中到大学，我看到那些有权的职位，体现的是管理，是服务。譬如，班长管我，书记管我，老师管我，领导管我，我觉得都是天经地义的，并没什么不应该，也没感受到权的力量。我也当过小小的学生干部，并不觉得我手里握有什么权，我只是想在领导安排给我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付出自己心血，尽到自己的责任，为大家服务好。

每一个职位，我看到的都是一份责任，一个需要付出自己心血的岗位，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是有油水可捞的肥缺。那个时候的青年学生，看问题想问题都非常单纯、非常简单。

尽管在学《毛选》的时候也看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样的经典警句，这个“政权”的“权”到底是什么，还是很不清楚。权，似乎与我无关。潜意识里，我一直只要求自己听党的话，在党的领导下，在党员干部的领导下，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文革开始，校党委轰然倒坍了，被夺权了。那权既不是被我夺的，也没夺到我的手里。权与我还是不沾边。

在学生中，对“权”有深刻理解并且极其重视的，当数蒯大富。他在工作组刚进校不久，就在一份大字报上写下了引起工作组警惕的关于“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的批注。

我不知道蒯大富在写这段批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明确地认识到权的意义、作用和威力。他能写出那样的话，有这样的思想，说明他对权的认识起码比我要高得多。我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他这样的意识。不管蒯大富写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明确权的实际意义，当他被工作组关起来失去人身自由，在全校批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想他对什么是权、权的威力有多大，必定已经有了切切实实的体会。是残酷的政治斗争教会了蒯大富真正懂得了权。

我也是从工作组反蒯的时候，感觉到权的重要性。工作组手里握着权，它就能名正言顺地调动一切力量，镇压它想要镇压的人。

与蒯大富有很大差别的是：我只感到权的威力。而蒯大富不仅感到权的威力，更感受到权的强制性，他在强制下不得不失去人身自由。

此后，我对权的重要性的认识比以前要多了一点。权，不仅有服务、管理的功能，更有强制、镇压的功能。但是，有这点认识，与体现在行动中，落实到斗争中，完全是两码事。我虽然懂得了一点权的重要性，我还是没有想过以后要去夺什么权、掌什么权。

与那些自诩为“最最革命”、“最最正确”的革命小将不同，我一直认为我是要革命的，但是从来不敢说我是最正确最革命的。我所希望的是掌权的人是真正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能善待我而不是压迫我的。我从来就没想过我要去掌什么权，因为，我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掌权的料。即使我成了总部委员，我也并没有掌权的感觉。我在总部里从来没分管过某个部门，从来就没有具体的实权。如果说有点权，那就是我有参加总部会议的权利，有议事的权利。

在“天安门纵队”开会讨论的时候，虽然也有个别人说我们“天安门纵队”也应该当仁不让地去争权，但是主流论调是我们“天安门纵队”不要争什么权，我们所要做的是以大字报来影响全校的运动。我们认为，如能以正确的观点引领全校运动的方向，也就是实际上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我们对这样的“虚权”看得相当重。而对于“实权”，譬如争名头、夺职位，我们从心眼里是鄙视的，不屑的。

蒯大富在夺权掌权的实践中不断有新的体会，不断地总结着经验。他在1967年初“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的文章。其中讲到：“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我还要说，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

当我读到这样“精彩”的文章，这样“经典”的句子，我只能自叹，我是永远达不到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写不出这样深刻的“醒世警句”。我老老实实的承认，对权的理解，对权的追逐，我永远都赶不上蒯大富，我只能做一个蒯大富所说的“糊涂虫、马大哈”。

蒯大富在“权”字上不断地下功夫，不断地创造“奇迹”：他把他对权的感性认识，经过提炼升华，上升到“权经”的高度。广为流传的蒯大富三十六条权经，不一定全部都是蒯大富自己成文的。但是我确实听他讲过不少与权经相类似的言论。什么“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只要目的是革命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左的错误是方法问题，右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政治斗争一定要有后台”等等，这些都是蒯大富和他的亲密战友在总部

会议上或底下的闲聊中公开宣扬的言论。我当时听了，感觉特别的刺耳，很不中听。这与我的传统观念，与我为人处事的准则格格不入。

今天看来，蒯大富在我们那年代的清华人中确是一位颇有权谋的政治高手！他把今天官场上流行的一些潜规则在几十年前就条理化，提炼成在造反派中极为风行的权经。

蒯大富从一开始就把414看成是向“井冈山”夺权来的，并时时刻刻提防着我和沈如槐向他夺权。实事求是地说，他提防“三纵队”，提防沈如槐他们夺权还有点道理。就我和汲鹏、王允方、高季章等人，就“天安门纵队”而言，我们真的没有夺权的心思。我在这里并不涉及权的观念很重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夺权或反夺权是对还是不对，我只是如实坦承，在我的周围，在“天安门纵队”里，就集结着这样一群心地上很真诚、很善良、很清高，但是在政治上很幼稚、很天真、很迂腐的书呆子。在当年的政治斗争中，这正是“天安门纵队”（后来是“三七战团”）的致命弱点，团派和“三纵队”（后来是“东方红战团”）远比我们成熟得多。

## 第六节 筹建革委会，蒯大富的一着妙棋

1966年12月19日，“井冈山兵团”的成立结束了从工作组撤走以后长达四个月间多个红卫兵“群雄割据”的局面。12.25打倒刘少奇的大游行和1.6“智擒王光美”的行动后，清华“井冈山”的声名远播，蒯大富踌躇满志，准备再立新功。

唐伟的自动辞职和重立山头给了蒯大富一个反唐、反托、彻底否定“八八”的口实。这场造反派的内讧既使唐伟的形象受损，更让蒯大富大大失分。三总部的裂痕并没因组织上的联合而弥补，反而在加深、在扩大，形成总部与“三纵队”的新矛盾。

整风中，“三纵队”咄咄逼人，蒯大富忙于检讨、狡辩，左支右绌，十分被动。

在干部问题辩论中，414既占了制高点，又抢得先机，蒯大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蒯大富对纵队派和414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以为只要把他们打成“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广大中间群众就能觉醒过来，跟着兵团总部走。没想到高压反倒把中间群众同情弱者的情绪给压出来了，犹如工作组对蒯大富施以高压也曾引来不少群众的同情一样。只是，这次角色换位了。

1967年的头四个月，兵团总部从成立时候的巅峰状态一路下滑（只有4.10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这件事风光了一阵），似乎一直都是浑浑噩噩地不在状态。

总部终于意识到，继续辩论干部问题只能在这场辩不赢的口水战中被414牵着鼻子走。总部决定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变被动为主动。经过一番讨论策划，提出了在5月底以前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的目标，并于4月30日宣布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实事求是地说，这确实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当时，一些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如上海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的“东北的新曙光”、贵州的“西南的春雷”67等等。基层成立革委会的就更多了。北大、北航等也都在积极筹备革委会。所以，成立清华革委会，确实是抓住了当时的大方向，紧跟了文革运动的步伐。一箭双雕的是，既为全兵团树立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又可以甩掉414在干部问题上的死缠烂打，并将414推入被动应付的尴尬境地。

对于这一招，“414串联会”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虽然一统清华，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红卫兵组织。一旦“井冈山兵团”披上了一件“清华大学革委会”的外衣，那它就是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4 1 4 在兵团内部搞点独立，玩玩对抗，是派别之争。要是在一个合法的政权内，4 1 4 的这些活动就有“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嫌疑，活动空间会受到极大的挤压。

4 1 4 面临着生存考验！

明目张胆地反对成立清华大学革委会，这在大道理上是行不通。4 1 4 只能强调，有关干部问题的大辩论还没有深入展开，广大中层干部还没有解放，哪些是可结合的革命干部还没有达成共识，团四两派还没有联合起来，甚至4 1 4 仍然是“非法组织”的身份。面对这样不正常的局面，清华大学要成立革委会的基本条件远没有具备，时机远没有成熟。现时如果要强行成立革委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实现了革命三结合的、有权威的、代表全校革命师生意志的革委会，而是一个以兵团总部为核心，以少数几个同意团派观点的干部、教师做点缀的“团记”革委会。

就这样，围绕着成立什么样的一个革委会，现在是不是适合成立革委会等重大议题，两派进行着激辩和争斗。对于“清华革委会”这一目标，团派打的是一场攻坚战——势在必得，4 1 4 打的是一场狙击战——志在必挡。

兵团总部公布了由蒯大富领衔的革命群众代表、革命教职工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共11人组成“革筹小组”作为清华大学的临时权力机构。蒯大富把我也拉进了“革筹小组”，我想主要的考虑是因为我是总部里公开的反对派。从形式上说，蒯大富不想让“革筹小组”给人以清一色团派的印象。他肯定也考虑到我是“4 1 4 串联会”的“总负责人”。但是我并不是以“4 1 4 串联会”的代表参加“革筹小组”的，因为此时蒯大富还没承认“4 1 4 串联会”是合法组织。

那时我的派性已经很强了。我对蒯大富的好意没有领情。与其他的4 1 4 头头商量以后，为了表示我不被蒯大富拉拢的决心，我发表了《孙怒涛严正声明》以表明我的立场：

所谓“革筹”是没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是没有代表性的，是强加给群众的，因此它不是真正革命的，它不能筹备革委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批判旗帜的“井冈山4 1 4”及其他革命同志施加政治压力，为草草地成立一个三凑合的班子鸣锣开道。为此，我严正声明：在政治上不承认所谓的“革筹”，在组织上不参加所谓“革筹”。总部的某些同志，无视于“井冈山4 1 4”及其他革命同志的尖锐批评，在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总部的某些同志，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一切责任！

4 1 4 的许多战斗组随即表态，坚决反对“革筹小组”，拥护我的声明。4 1 4 第十一次串联会也通过决议，“坚决不承认“革筹小组””。

5月10日，同为总部委员的王良生因为与总部某些负责人“存在着一系列原则分歧”而在此时公开发表了参加“4 1 4 串联会”的声明，这让我在总部里不再感到孤单。

这段时间，除了在干部问题、“红教联”问题等方面两派依旧唇枪舌战以外，总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加快了筹备革委会的步伐。

蒯大富做了一个让步动作，那就是在5月9日终于承认“414串联会”是合法组织。

紧接着，蒯大富做了一个进攻动作，那就是“搬出”谢富治这尊佛来打压414（也可能是谢富治主动来关心清华运动的，所以我在“搬出”两个字上打了引号）。

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在文革前任命的十几个副总理中，与那些被打倒、被批判、靠边站的其他副总理的处境截然不同，他是唯一一个在文革中彻底投靠了江青，被毛泽东信任重用红得发紫的副总理。

作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过问清华的文革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完全应该的。

我最早知道谢富治的名字是在党史上。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陈谢”就是陈赓、谢富治。对于包括谢富治在内所有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帅们，我一直都是深怀敬意的！

5月12日，谢富治来清华，接见兵团总部和414的负责人。据王良生回忆，蒯大富向谢富治介绍我的时候，称我是““414串联会”勤务站总负责人”。

谢富治听取了蒯大富关于学校运动的汇报，也听取了414对总部的意见以及我们的要求。从谢富治的指示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他对蒯大富的偏袒。他指责“414大方向有问题。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当我们想提出联合方案时，谢富治傲慢地说：“我不看，你们的方案肯定通不过”。谢富治接见两派的时间长达7小时，但是对消除两派分歧，促进两派联合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蒯大富是毛泽东树立起来的红卫兵小将的一面旗帜，又深得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宠爱，谢富治要旗帜鲜明地支持蒯大富，这本来是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他不应该用亲团派、压414的态度来支持蒯大富。这样的态度，只能助长两派的对立情绪，无助于两派通过通过协商求同存异，最终也不能帮助蒯大富实现成立革委会的目标。

谢富治对我们的无理指责，我听了很反感，不服气。我在给414群众原原本本传达谢富治对我们的批评后，马上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的话对不对，大家自己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嘛！”这话用意很明白，效果也很明显。“414对谢的话极为不满，当晚12点，有60人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告状”。

5月21日下午，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兵团总部与414负责人，主持两派的协商谈判会议。代表414方面出席的有孙怒涛、沈如槐、宿长忠、刘万章、王良生、龙连坤等六人。我是首席代表。团派以蒯大富为首，鲍长康、任传仲、陈继芳等参加，人数比414要多。

会上，两派都向谢富治告状，互相攻击，自我辩白，极少自我批评。谢富治听了很不乐意，要我们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做口头革命派，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做大联合的促进派。两派都表示拥护谢副总理讲话。谢富治说，你们都赞成不打内战了，那就把共同点达成一个协议，回去执行，慢慢创造大联合的气氛。

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两派达成了著名的《四项协议》：

1、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

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2、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渐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3、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

4、“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在协议协商的过程中，双方的争论极为激烈，都希望协议对己方有利的多一些。除了龙连坤作为革命干部不便讲太多率直的话之外，我们其他五个都是学生，与团派代表在言词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沈如槐说话最多，最为力争。我说话较少，因为我是首席代表，我得表现得稳重一些。要么不说话，要是说话，就表示了4 1 4的最后意见。

对《四项协议》的第一条，双方都没有异议。

第二条，关于按班、系实现大联合。团派坚决支持，因为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解散“4 1 4串联会”，然后化整为零地吃掉。4 1 4这方则深有顾虑。纵队派已经在三月初吃过解散纵队的大亏了，当然不愿意马上就搞“按班、系的大联合”。心中虽有这点小九九又没法公开说出来，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显然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条款。团派认为非写上不可，谢富治也坚持这一条必须写上。最后，经过激烈争辩，4 1 4终于争得了“逐渐”两个字作为过渡，即同意“逐渐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

第三条，关于“革筹小组”。团派认为无需调整，主张原封不动。4 1 4认为“革筹小组”里除了孙怒涛以外都是清一色的团派，而且里面还混进了宋××这样的“坏人”，所以必须调整，增加4 1 4方面的代表。“革筹小组”的名额分配直接关系到革委会的权力分配，所以双方都不让步。谢富治知道如果团派一点都不让步的话，这协议难以为4 1 4所接受。他表态说应该适当调整，团派这才不得不同意调整。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式的协商、谈判，双方同意调整扩大后的““革筹小组””名单共22人，其中学生13人，革命干部5人，教职工4人。组长蒯大富，副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

在13名学生代表中，团派占9人，4 1 4有4人。沈如槐对9：4并不满意，想再争取多一点，最好是基本对等。这点上，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能占据4席，已经很有话语权了。比起我在兵团总部里处于极少数的境遇，我觉得9：4已经很不错了。

4 1 4方面推荐孙怒涛、沈如槐、汲鹏、王良生、龙连坤（干部）、李振民（职工）参加“革筹小组”。我、汲鹏、王良生的观点在4 1 4中都属于比较温和的，龙连坤、李振民是干部，也只不过激，这几位蒯大富都表示接受。沈如槐是“东方红战团”的，观点比较激进。蒯大富对“东方红战团”、对沈如槐的成见很深，对他参加“革筹小组”表示强烈反对，坚决不同意。我们坚持沈如槐必须参加“革筹小组”，因为沈如槐代表了“东方红战团”，代表了4 1 4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僵持不下，最后还是由谢富治拍板，同意沈如槐参加“革筹小组”，蒯大富生气也没办法。

照理说，《四项协议》中，最关键最有实质意义的是第三条，因为这一条涉及到权力分配。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双方争议最激烈的居然是第四条，即““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这一条上。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www. cnd. org /](http://www.cnd.org/)

---